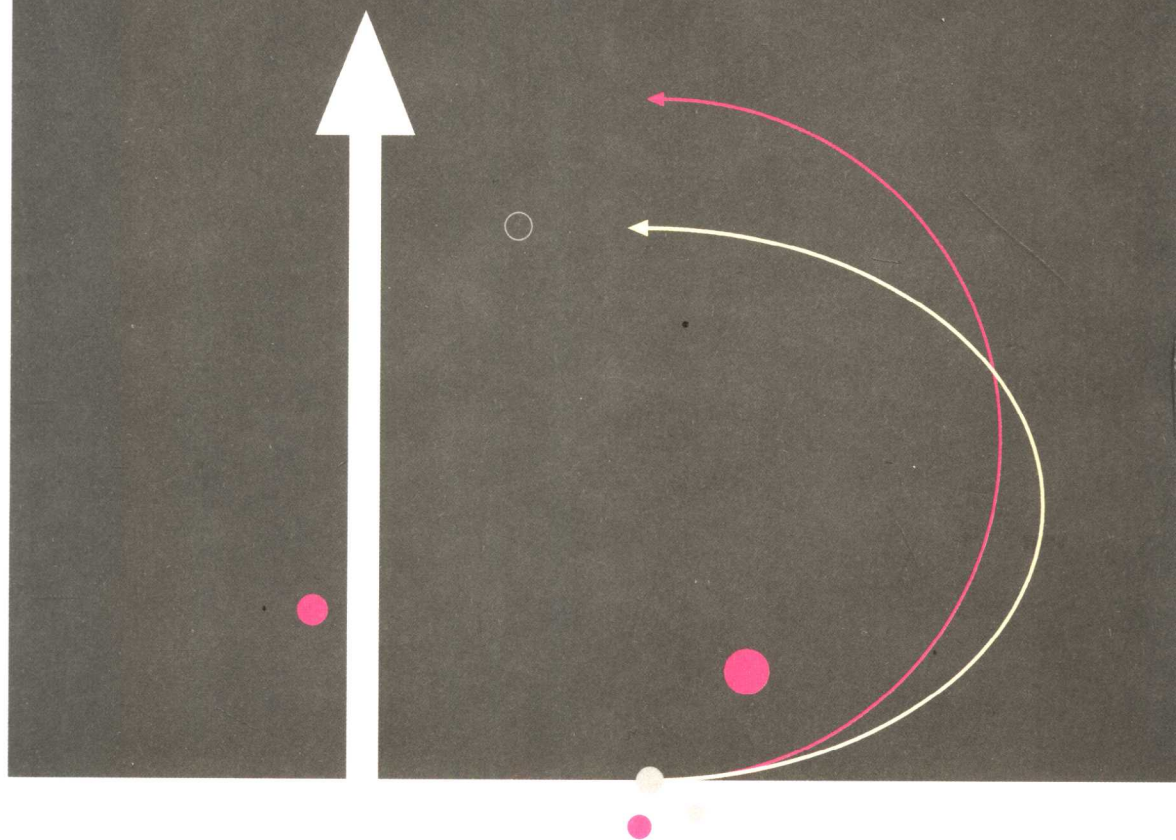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政治与社会译丛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冯钢 刘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扰乱工业生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像这样解释人类历史上最深的危机之一必然显得过于简单，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尝试要更无知了。即把一种文明——包括它的物质实在和精神气质——化约为数日确定的几项生硬制度，以及选择其中之一，并作为这些制度的基础，并接着推论这一文明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是源于其经济组织的某些技术性本质。文明，正如生命一样，源自一系列独立因素的交互作用，通常是不能化约为一些有限制的制度的。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 与经济起源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Karl Polany

冯钢 刘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Karl Polanyi

中文版根据 Beacon Press 2001 年版译出

© 1944,1957,2001 by Karl Polany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Kari Polanyi Levit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英) 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1辑)

ISBN 978-7-213-03443-5

I. 大… II. ①波… ②冯… ③刘… III. ①国际政治
—研究—20 世纪 ②世界经济—研究—20 世纪 IV. D5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562 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6-53 号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卡尔·波兰尼 著

冯钢 刘阳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177 号)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3 万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3443-5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

》》

》》 在这部关于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经典著作中，卡尔·波兰尼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的分析不仅阐述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缺陷，而且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可怕的社会后果。新的序言和导言揭示了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波兰尼的精辟分析所具有的新的价值。

》》 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民主转型和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 胡安·J. 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

[英] 凯特·纳什 阿兰·斯科特 主编

《公民权研究手册》

[英] 恩靳·伊辛 布雷恩·特纳 主编

《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

[英] 帕特里克·邓利维 布伦登·奥里里 著

责任编辑：王利波

责任校对：鞠 朗 朱晓阳

封面设计：张志伟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一辑主编 景跃进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丛书第一辑总序

作为一项计划工程,本丛书第一辑的书目选择乃是众多考量平衡的结果,其中三个因素值得说明。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理性算计是任何事业得以展开的必要环节。这一变量对于本丛书目录选择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选译之书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潜在读者群,而不应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读物。于是,跨学科性便成为选书的一个操作性标准。

令人宽慰的是,尽管这一标准具有实用的品格,但它并不影响所选之书的学术品位。这固然是由于跨学科性本身并不与学术质量有什么矛盾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书目选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范围。在横向维度上,丛书第一辑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两者杂交的产品——政治社会学,以及经由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脉络而扩展到旁临学科。在纵向维度上,它涵盖了历史研究与当代学术的前沿性探索。

在这一广泛领域中,对书目选择发挥指导或定向作用的坐标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这自然成为选书的第二个操作性标准。丛书第一辑所选作品虽然涉及不同的学科,且具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但它们之间有着一个相似或共同的主题。借用扬(Iris Marion Young)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政治化”(扬使用该术语来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理论的研究概况)。

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改革前后数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高度政治化,到解/去政治(全能国家的消退,非意识形态化,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生活的兴起等),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所谓“重新政治化”并非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治的回归,而是指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纳入公共领域的视野,或

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或成为需要政府加以解决的政策议题。从理论上,重新政治化过程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发,以及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建设的进步,基于公民行动基础上的广义的利益政治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在众多社会问题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生态环境、性别平等、社会公正等方面——将承担起与公众期望相适应的政治责任。质言之,市场经济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同构效应,使得以前被认为只有在西方国家才发生的事情或现象,我们今天也开始程度不同地面临了。

选书的第三个操作性标准来自学科建设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过选择性的译述以窥见西方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新发展趋势,为本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上述诸种考量虽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总体目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对中国特色的追求(从制度层面到学术品格)是在世界文明这个大舞台上展开的,了解“他者”(尽管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西方”,但其实不止是西方)的过去、当下及发展趋势,乃是追求中国特色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基本背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西方与认识中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翻译与本土研究之关系,亦当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景跃进

2006年冬

中国人民大学

前 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能够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在R. M. 麦基弗(R. M. MacIver)为这本书的1944年首版所写的导言中——那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还仅仅只是存在于纸上——他以一种与波兰尼相似的预见能力写道:“这本书在当下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们揭示了历史教训。”如果这些人当时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并认真对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训,那么他们所鼓吹的政策就会比实际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vii

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 and 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

viii

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的。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体上，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已经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认识到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在争论。例如，人们对金融市场需要政府管制这一点，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还没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获得一致意见。

自现代以来，有非常多的证据支持以下历史经验：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但我们同样知道，增长可以为社会的绝大部分带来巨大的好处，正如在一些更开化的(enlightened)发达工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

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这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他的著作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统研究方法(它是由20世纪之初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所预示的)的先驱。现今仍然有少数经济学家在坚持金本位的信条，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问题正是由于偏离了金本位体系而造成的，但这使得自发调节市场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战。浮动的汇率是那个时候的常规，人们可以认为这将支持那些信奉自发调节的人所持的立场。毕竟，凭什么外币汇兑市场应该由不同于支配其他市场的规则来统治呢？不过也恰恰是在这里，自发调节市场的软肋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从来不注意这个信条的社会后果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类市场(与许多其他资产市场一样)表现出过度的变动性*ix* (volatility)，也就是说，表现出超出构成要素的变化所能解释的变动性。同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投资者的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教训：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the U. S. Treasury)(不管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治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MF)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

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市场应该与其他市场区别对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相矛盾——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场体系的同时,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经常干预汇率市场,为外来债权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与此同时却索要高利率而使国内企业破产——已经在 19 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被预示了。事实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已寥寥无几了,并且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

不过,今天,战线的位置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性。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些区别是容易摒弃的: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另外,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听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这些最近的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往好里说——却是明显不足的。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由国际贸易使一个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加平均收入,尽管它会使一些个人失去工作。但在失业率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贸易自由化而毁掉的工作机会可能明显要比它所创造的多,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捆绑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使得创建工作岗位和新企业成为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完全相信某种形式的赛伊定律(Say's law),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

它会对工人的工资要求产生压制力量。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表明的是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极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是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对象。它包括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此外,随着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到,词汇已发生了改变。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那里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乃至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对印尼的食品补助金,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的(并且确实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骚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造成了古老(尽管有些比较脆弱)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这种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投资者不会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到那些社会中存在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会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the disadvantaged)的办法。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以担负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诚然,一个农民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备感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有报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人会遭到他们不可控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却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美好效果。明显不能成立的是,

通过让自己满足于更低的工资,个人就能够立即获得就业。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并不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是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对这一点甚至也是有解释的,但讨论这些解释会让我离题更远)。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出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来自 19 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它是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现代版——的鼓吹者们遗忘了。

xii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对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的 25 年中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前面我已提到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是有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的:破产。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破产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的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而这些人其实在出借时并未守持应有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让那些旁观者付出沉重代价的政策,尽管这些工人和小企业在危机的最初来临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更富戏剧性的是俄国的失败。这个曾经成为一场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又成为一次新实验的对象。这个新实验就是,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 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这个国家的人民曾得到承诺,一旦市场的力量释放出来,经济就会欣欣向荣:那种资源配置被扭曲的、因社会所有制而导致激励不足的、低效率的中央计划体系,将被分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

然而繁荣昌盛并没有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比例(以每日四美元为标准)从 2% 上升到接近 50%。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

xiii 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年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的投资场所,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毫不奇怪,资本成群结队地逃了出来。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于不折不扣萧条中的国家。现在,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而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实际上是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它们教导发展中国家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1842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而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其他扩展性服务。在西欧,对资本的限制性规定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加勒比地区的美国公司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尽管有时这些干预是正当有理的,因为它能被当做针对其他政府进行的干预的必要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保护主义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农业方面的那些例子。在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到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罗斯的铀。*xiv* 香港长期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被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摧毁它的经济时,它对两者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然而香港的干预成功了——它稳定住了那两个市场,避开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其钱。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并且即使是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的简单药方所蕴含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波兰尼是在今天进行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护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如果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为市场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那么东亚的成功则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明。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提到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需要,但他们更多是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消除那些社会契约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契约提供了增强社会和政治稳定——而这种稳定是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经济安全。当然,事实上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的市场失败的最戏剧性的例证:正是短期资本流的释放,在全世界晃荡着想寻找最高回报的大量美元——它们只受情绪化的快速理性和非理性变化的支配——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

xv

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主题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代表了对自由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但正如波兰尼所言,“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根植于一个无法再运转的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鼎盛时期大致在1990—1997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毕竟,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对这些信条——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的拒斥以及对“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者

“新工党(New Labor)”政策的支持。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化国家只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国的风险。这些国家原本是有选择余地的,它们同时受到西方和东方的劝诱,而西方对策的失败实例面临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的危险。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含有巨大风险的主义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无数种声名狼藉的方式来加以拒绝。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xvi

波兰尼把市场看做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做一个还要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做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做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做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却从来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用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的增加,或者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无力感的增加。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在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断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很可能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赖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当我们的左手似乎是在通过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人赋权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又把它收了回来。

波兰尼非常恰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eleano Roosevelt)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